

Gu Tinglin's Criticism on the Trend of Literati during *Jiajing* Period and his Thought on Statecraft

Th'ng Bee F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Tunku Abdul Rahman

Yam Kah Ke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In regards to Gu Tinglin's academic achievements, scholars seem to focus more on his seemingly textual authentication writings and often ignore the great thoughtful aspects in these works. By reading the *Rizhi Lu*, this article notices particularly that the way planned by Gu follows a line which involves studies of classics, governance, and the thinking of statecraft. This in reality shows that practical concern is deep-rooted behind his textual criticism, reflected especially in his thought of statecraft. Human beings always grow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confined to a special system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us makes them inseparable from time and space in which they live in. By relocating Gu's writings to the big environment, examination shows that whenever the *Rizhi Lu* talks about textual criticism, it often mentions how things had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Jiajing* period. In order to see the crucial point of the formation of Gu Tinglin's thought, thinking trend and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trend of literati during *Jiajing* period, associate closel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ree major points,

namely the rebuking of empty talks, disparag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knowing the sense of honour and shame, as well as using Gu Tinglin's criticism on the literati trend around *Jiaying* period as a main line to illustrate Gu's statecraft thought.

Keywords: Gu Tinglin *Rizhi Lu Jiaying* Literati Trend Statecraft

从顾亭林对嘉靖世风之批评看其经世思想

方美富

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

严家建

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摘要

关于顾亭林的学术成就，历来学人似乎较集中在许多看似考据的著述文字，往往忽略了内里大有思想性的文章。本文通过阅读《日知录》，特别留意到经术、治道、博闻这条顾氏规划的路线，正表示他的考据背后有很深的现实关怀，主要反映在其经世思想之中。人类总是生长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具有特殊的制度、特殊的文化背景，所以这一切都促使一个人脱离不开他所处的时间与空间，重新放置顾氏的著作到整个大环境来考察，我们可发现《日知录》与其他著述，每每引证考据之时，皆言及“嘉靖以前”如何“嘉靖以降”又如何，以此可知顾亭林思想形成的一大关键，实在与明代思潮与文化，特别是嘉靖世风，存有密切的关联。本文从排空疏、贬科举、知廉耻三方面着眼，以顾亭林对嘉靖前后的世风所作评语为主线，藉以说明顾氏的经世思想。

关键词：顾亭林 日知录 嘉靖 世风 经世

一、前言

历来讨论顾亭林（1613—1682）思想的学者，大多肯定其清学宗师地位，称其乃考据学不祧之祖，每论多将《日知录》等作品当考据养分，启发无数来者。又或者大凡谈亭林对理学的批判者，则突出其“经学即理学”¹的命题，甚少将亭林考据的成因，放置到当时的整体风气作讨论。本文试图重新思考亭林对明清之际转向之观察，此一新动向又将提出何种视野，与后之来者有何差距，或者亭林是如何去诠释他心目中的晚明？这也是比较亭林与乾嘉诸子可以明显看清的，无怪乎干嘉学人在考据学上后出转精，许多方面比亭林做得更为细致，却仍给人只得“半个亭林”²的印象。大儒从来都是提倡研究当代掌故和时事的，顾氏一生也特别重视这方面的讨论，惟吾人发现只要论及嘉靖以降世风，其总体评价总是负面的。本文认为，顾亭林谈论嘉靖世风，藉以阐发其明道经世的思想，才是重心所在。他与乾嘉诸子最大的不同，亦可说是别有幽怀，此间种种变化不仅限于政治，也涉及社会观，人生观和学问观念、文学动向等思想文化之全体，接近士大夫精神所关心的面向。

顾亭林在《与人书十》中，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了研究新事物与创造新作品的关系：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

¹ 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58。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27。

²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60。又，此著名论断乃任公受刘献廷启迪，刘氏用的是“半个学者”，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页122。

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剖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馀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³

显然，他对嘉靖以下学风最不满意的就是不学无术，只要我们比较顾亭林另一处之话语，就知他对当时的风气非常不认同：

旧日文字破题，或二句，或三句，必尽题意。嘉靖八年，主司变体，创为轻佻之格。⁴

所言变体，明显攻击嘉靖科考。这一年正是皇帝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子，王阳明之学进入权力中心。十一年后侍郎黄宗明在兵部，戚贤、魏良弼、沈谧等在科，与大学士方献夫俱主会，可谓规模庞大。王学与科考的结合对于注重“采铜于山”的亭林来说，正是倡导无定理之学风，以利禄相结合，导致不出经世人才。

从顾亭林对嘉靖世风的攻击，或以为他是个激烈的复古主义者，他虽说出“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⁵的话，似对现状有过多

³ 清·顾炎武，〈与人书十〉，《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页93。

⁴ 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举业〉，《日知录集释》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056。嘉隆的风气转变，甚至科考厌《五经》喜《老》《庄》，破题用庄子义。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破题用庄子〉，《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57。《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八月条，载有阳明学透过科举进入朝廷之纪录：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见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4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页1301。

⁵ 清·顾炎武，〈音学五书叙〉，《音学五书》，影印观稼楼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3。

不满，但我们亦不要忘记，他并非是要原原本本的复制，而是旧中有新地创造性转化，才是他的真正心志之所在。这点只要与他反对明朝世风过多依傍，主张摆脱空谈义理而转向学问上求索经世之道即可看出。

二、空疏之学无用于经世

顾亭林认为明人不学，特别是嘉靖以来士人不读传注，未能追本溯源，舍清议、尚清谈、不谈俗事、不谈民生、专治“讲学”，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关于不读传注之学风，他认为也可以从刊刻中窥见：

【原注：王槐野《与郑少潭提学书》言“关中士不读朱注，不看《大全》、《性理》、《通鉴》诸书”，当嘉靖之时已如此。】欲令如前代之人，参伍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数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三经注疏》为何物也。间有一二《五经》刻本，亦多脱文误字，而人亦不能辨。⁶

经传之所以重要而必读，不在于它们的高深道理，而是其经世致用的功能：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教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

⁶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北卷》，《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85-986。

不为。而既以明道教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避也。⁷

总之，读经重在务实是顾亭林一贯的主张，并认为舍务实而清谈，虽高妙亦难免误国。关于清谈与误国的关系，他曾多次引王弼、何晏为例，认为清谈之祸甚于桀、纣。然而，《日知录》“嘉靖更定从祀”条中却对王弼列二十二人之中配享宣尼庙堂一事表示肯定，原因是王弼有传注之功。易言之，亭林对传注之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越亡国之祸。在他看来，王弼清谈之罪较之其传注之功来说还是可以原谅的；那么阳明的空谈心性也是可以原谅的了——如果阳明有传注之功的话。可见，空谈误国只是亭林批评阳明的一个次要原因。重点在于，阳明不仅无传注之功，且大放厥词否定六经和传注的价值，如《传习录》谓“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⁸。《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条：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⁹

这里，顾亭林把姚江王氏之良知学与王弼的清谈、王安石的新说相提并论，意在指责其清谈误国。在“王介甫之新说”下，亭林作新论：“《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

⁷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79-1080。

⁸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页44-45。

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68。

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¹⁰王弼、何晏为侯景之乱负责，王安石为靖康祸乱负责，那么阳明对明王朝的覆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

今之学者生于草野之中，当礼坏乐崩之后，于古人之遗文一切不为之讨究，而曰：“礼，吾知其敬而已；丧，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学而议朝章，以清谈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窥汉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¹¹

显然，此处强调学人必须探究古人遗留下来的经典，绝对不能以空谈当借口来推搪或取代经世之学，否则就不是学孔子，甚至会导致朝政崩坏。

顾亭林将明代空谈心性的弊端指向阳明，实在是以嘉靖一朝作为学风颓废的转折点。其中一个论据，即是科举用书的改易。他说：

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¹²

引文中所列诸篇是何等重要，时人竟然不读，可见亭林对于经典

¹⁰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68-1069。

¹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檀弓》，《日知录集释》第一册，页348。

¹²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拟题》，《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45。

是何等的执着。又谓：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¹³

隆庆时势转移，虽只是官方的动作，而较之于嘉靖之前的士风已明显不同。顾亭林表示，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这里反映了两个观点：第一，程朱之学实为正统；第二，嘉靖后之学其实是“以禅窜圣”之学，是对圣人之学的莫大反动。综合言之，嘉靖之后，正统圣学已岌岌可危。

顾亭林对于经世的关怀，又可见之《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

¹³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54-1055。

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¹⁴

这里的“今之清谈”显然指向姚江王学，即顾氏所谓“遽弃传注”¹⁵、“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¹⁶的新学。顾亭林指责阳明心学空谈心性，不懂夫子尊王攘夷、诛乱扶正的经世事功就是夫子的性与天道，不务修己治人之实学，从而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后果。亭林尝谓“非器则道无所寓”¹⁷，若经世事功为器，性与天道为道，那么离“器”则无“道”，此为王学脱离社会义务空谈心性之失。

¹⁴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第一册，页402。这段明显指向甘泉阳明，无言、忘言、不言、一贯皆是甘泉、姚江学派惯用之词。如〈别后与赵元默言怀〉“桃李默不言，流莺语春风；语默各有性，此理谁能穷”、〈予友方子思道弃湖广宪金逃归三衢山筑室以居号通吏窝寄题数语名豪〉“兀兀此窝中，无言自超越”、〈题邹山人江湖诗舫因以赠之〉“忘言本无诗超诣天机”，例子非常多，尤其页164、168。见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影印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黄楷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阳明论“无言”，见〈阳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赠崔子钟和之以五诗于是阳明子作八咏以答之〉、〈次栾子仁韵送别四首〉、〈忘言岩次谦之韵〉、送德声叔父归姚，见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3册，页717、781、790；“忘言”见〈与杨仕鸣〉、〈忘言岩次谦之韵〉、〈天泉楼夜坐和萝石韵〉，见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第3册，页199、781、826。“不言”见〈别三子序〉、〈别湛甘泉序〉，见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页241、246。“一贯”见〈别湛甘泉序〉、〈象山文集序〉、〈书汪汝成格物卷〉，见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页245、261、286。另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87、134。王湛学说递相出入，见清·黄宗羲，〈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138。

¹⁵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举业〉，《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54。明代抛弃经书风气的记载，见清·黄宗羲，〈学正曹月川先生端〉，《明儒学案》卷四四《诸儒学案上二》，《黄宗羲全集》第8册，页359-360，相关讨论见日·山井涌，〈经书与糟粕〉，《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87年，页405-426。

¹⁶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科场禁约〉，《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60。

¹⁷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形而下者谓之器〉，《日知录集释》第一册，页42。

然而，顾亭林似乎并非单纯指摘“心”之不是：

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¹⁸

在这里，心显然只有“认知”的功能而无“本体”之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根据亭林的理解，阳明心学之失在于“盖谓心即道”，即把心当成本体本身来追求。故此，亭林重新定义“心学”二字，谓“心学者，以心为学也。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意即心只是具备主观能动的认知道理的功能，而非客观的性、理、道本身。人心如果缺乏此认知功能，则当以心为学，即其所谓“求放心”；“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亭林之“所病乎心学者，为其求心也”¹⁹。总之，亭林认为空疏弊病之起源，在于“以理为障”、“不欲言理”²⁰，也就是脱离了经世事功之理而妄图把握圣人之道所引起的。如此，则学人将落入“内释而外吾儒”，成为“先王之所必诛”的“左道惑众之徒”²¹矣。

三、科举考试之弊端妨碍经世

对于科举考试，顾亭林有句名言：“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

¹⁸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心学〉，《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49。

¹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心学〉，《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52。

²⁰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心学〉，《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49。

²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内典〉，《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46。

愚一日。”²² 科考自隋唐始兴以来，虽有统合文化、社会的功能²³，但其于明末之转变并非单纯制度史的问题。顾氏敏锐于这种转变，感慨地指出“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²⁴、“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²⁵，当时举人以“白徒”占多，无怪乎一中举后即汲汲于营生，忘却了经世事功。

顾亭林认为，“生员冒滥之弊，至正、嘉而极”²⁶。原本为保持质量而让生员不断考试，结果造成生员数量庞大，也因此累积了一大批白首童生。为了突破这层困局，不少人以利禄利诱，希望能得仕进。顾亭林尝言之曰：

黄鲁直言：“数十年来，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奖后生，故华而不实。”本朝嘉靖以来亦有此风。而陆文裕所记刘文靖告吉士之言，空同大以为不平矣。²⁷

提拔后生本无可厚非，可是落得华而不实，那就本末倒置。所以黄鲁直的话，一到亭林手里重新拈出，实在是嘉靖时之风气的一种批判。顾氏之言在王学仍流行的时候，固然是反传统的，但却能下开后世风气，警惕士人们应该轻文章而重节义，并且向外用心以便经营天下国家之大事。

²²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财用〉，《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702。

²³ 余英时，〈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北：时报文化，2007年，页226。

²⁴ 清·顾炎武，〈与潘次耕札〉，《亭林余集》，《顾亭林诗文集》，页166。

²⁵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经义论策〉，《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40。

²⁶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经文字体〉，《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56。

²⁷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文人之多〉，《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85-1090。又，〈停驂录〉载李梦阳此事，见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74。陆深与梦阳交好，与刘健亦敬重，顾亭林引此典故，目的是要突出文人与经世终究殊途。

明中叶时，学官徇私舞弊，大量不合格生员数量参差不齐。嘉靖五年（1526），桂萼就提出“天下提学官多不得人，无以风励人才，请加考核”²⁸。嘉靖初期，明世宗力图通过对乡试的整顿肃清科场风纪、清查歪风，可惜由于积重难返，歪风屡禁不止，最后只得以“各罚俸二月”²⁹作罢。由此可见，经过长时期的实行后，八股考试弊端增多已经不是嘉靖皇帝愿不愿意改革的问题了。³⁰

明代是八股文最终形成的时代，但在明代的初期，八股文尚不是科举考试中的文体形式，洪武年间所用的八股文未有此后那样的程序化。虽然《明史》说八股文“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³¹，但顾亭林却说：“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³²说明明朝初年的八股文尚没有形成严格规范的程文式样。按明清文献记载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八股文的真正成熟期当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时期。梁章钜评价明代成、弘、正、嘉时期的八股文章时引方望溪言：“明人制艺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馀年中皆恪尊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

²⁸ 明·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编撰，〈考核提学官之始〉，《礼部志稿》卷七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598。

²⁹ 清·谈迁，〈乡榜填改〉，《枣林杂俎·圣集》，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814。

³⁰ 商衍鋈先生在论述明代八股文时说：“明代分成化、弘治以前为一期，正德、嘉靖为一期，隆庆、万历为一期，天启、崇祯为一期。明初自洪武、永乐、景泰、天顺以至成、弘，百馀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及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是为明文极盛之时。隆、万间兼讲机法，专事凌驾，轻剽促隘，务为灵便，虽巧密有加，有气体颓然矣。天、崇之间，或失于苦，或失于浮，自后诸家力移风气，则有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雕刻物情，凡胸锁欲言者，皆就题以发挥之。”此言天下轻剽者充之。商衍鋈，《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253。

³¹ 清·张廷玉等撰，〈选举二〉，《明史》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693。

³²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试文格式〉，《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51。

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³³ 钱谦益说：“嘉靖以前，士习淳厚”³⁴，明人李乐甚至说：“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³⁵ 也就是说，从洪武到成化、弘治时期，八股文基本上是沿袭了宋元的经义文章，严格遵循对儒家经书和注疏的阐释理解这样一个行文原则。

科举考试过度重视文体此一弊病，顾亭林同意永乐年间即有此现象。³⁶ 然而，“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³⁷。一些明人自著文集评价这一时期的科举取士可证亭林此语，例如：

明朝《四书》《五经》，主意讲说，非为解经而已，皆所以为作时文之地也。时文以艳丽妩媚为工，故经书主意，有嫫媿之名，非斋名，亦非人名也。³⁸

成化、弘治年间，科举制在八股时文所呈现的“既彬彬盛矣”之下，也透露着与此不谐调的僵腐之气。演变到嘉靖年间，便出现了“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刻，以误正学”³⁹的恶劣风气。科举取士的标准已被量化为独重程

³³ 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咸丰九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534。

³⁴ 清·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家塾论举业杂说》，《有学集》卷四五，《钱牧斋全集》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1509。

³⁵ 明·李乐，《见闻杂纪》卷一一，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清补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763。

³⁶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举人》，《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26。

³⁷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试文格式》，《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51。

³⁸ 明·朱之瑜，《答吉弘元常问八条》，《朱舜水集》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420。

³⁹ 明·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十月乙未，卷一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页569。

朱理学的八股文写作，惟此一途才是科举之荣和仕进之路，明代世风也与成化以前不同而出现了为功名利欲而科第的逆转，“盖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市井之趋利势固如此，学者之趋简便亦至此哉！”⁴⁰ 此时的八股文非但文辞“配合缀缉，夸多斗靡，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而且命题和立论内容也是“经义浮夸，论议鄙俚，作判味法律之本意，答策聘书生之常谈。”⁴¹ 科举考场在应试的士人心中已成为行文搜奇猎艳，解经牵强附会，论世情乡曲真伪不辨的瞒天过海之所，甚至“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⁴²，连祖训所说的遵程朱之命都可以不顾及。⁴³ 因此，许多有识之士痛加抨击科举中的八股冗滥之风，嘉靖时屡屡出现的“正文体”之说即缘由于此。所谓“正文体”，即呼吁“取士之文，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⁴⁴，“非是不得滥取焉”⁴⁵，意即科举取士要选择文字纯正典雅者而不许妄为臆谈。此外，科举考试与八股文的冗滥也被看作是世风日下的渊藪，“是其所坏者不止文体一节，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⁴⁶，史载“至

⁴⁰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81。

⁴¹ 明·张孚敬，《慎科目》，《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三，敬乡楼丛书，1935年，页16。

⁴² 明·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十月乙未，卷一九，页569。

⁴³ 明洪武十五年所颁《卧碑文》第三条载“习举业即穷理之一端，四书经文策论，务要说理详明，不许浮夸怪诞，记诵旧文，意图侥幸。”见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页47。这一年是朱元璋重开科举之年，他反对“浮夸怪诞，记诵旧文”，使科举考试中祇会写空洞经义文章的人难以入仕。《卧碑文》在此后的明代带有祖训和法律的性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是任何人敢于无视的条文。《明会典》载“习举业亦穷理之事，果能精通四书本经，便会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实习啊功夫。惟记诵旧文意图侥幸出身，今宜通革此弊端。其所作四书经义策论等，文务必要典实平顺，说理详明，不许浮夸怪诞，至习字亦须端楷，不乖教养之意。”见明·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736。

⁴⁴ 明·张孚敬，《慎科目》，《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三，页16。

⁴⁵ 明·王世贞，《科试考四》，《弇山堂别集》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597。

⁴⁶ 明·王世贞，《科试考四》，《弇山堂别集》卷八四，页1596。

嘉靖末年，时文冗滥，千篇一律，记诵稍多，即掇第如寄，而无赖孝廉，久弃帖括者，尽抄录小本，挟以入试”⁴⁷。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嘉靖时期，因长期以八股取士而衍生的诸多弊端已日渐显露，并与明朝以科举选拔道德贤能之士，以通儒硕学之人为治国人才的初衷大相径庭。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科场已是内外弊端丛生，各种矛盾进一步凸显，科举考试与八股文也开始了其衰退过程。至明末天启、崇祯朝，科举与八股文伴随王朝的腐败而日渐衰乱，整个社会对以八股文来取士的科举考试已是怨声载道。

明代前期，由于地位不高以及禁言等原因，生员在地方上可以参与的事务是比较有限的。随着科举制度的颓败，生员的影响逐渐扩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二）结社对于地方文化风尚的影响。关于前者，顾亭林在《生员论》中批判了生员在地方的种种不端之行：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端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之为市者，生员也。……而一二识治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⁴⁸

至于地方文化风尚的影响，主要是结社的八股文选本，一般由书贾聘请名士撰写，选本一出，“以为揣摩风气之的，一出而天下

⁴⁷ 明·沈德符，《会场搜检》，《万历野获编》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页413。

⁴⁸ 又言“座师”、“房师”、“同年”、“年侄”、“世兄”、“门生”、“门孙”、“太老师”等等生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朋比胶固，牢不可解”。见清·顾炎武，《生员论中》，《亭林文集》卷一，《顾亭林诗文集》，页22-23。

应响”⁴⁹。顾亭林认为此乃环环相扣，一变则儒生逐利，逐利则模仿，模仿则文体日变，轻佻之格兴：

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⁵⁰

又感叹说：

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⁵¹

总之，顾亭林对科举的批判是将八股冗文、士人模仿、利禄无耻三项因素结合看待并一起批判的，不过其种种评断最终还是指向官员，特别是在嘉靖时开始得势的在朝王学，重点依然是锁定在士阶级忽略经世事功此一指摘。

既然顾亭林举出科举弊端如斯，是否可谓其经世思想中欲取消科举？其实不然。他说：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⁵²

显然，“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之语说明了科举考试仍然是得保留的。问题在于如何“改革”。关于这点，顾氏主要从读书与考制两方面提出了建议。读书方面，士子必须熟悉儒家主要经典

⁴⁹ 清·叶梦珠，〈名节一〉，《闾世编》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02。

⁵⁰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试文格式〉，《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51。

⁵¹ 清·顾炎武，〈与潘次耕札〉，《亭林馀集》，《顾亭林诗文集》，页166。

⁵²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拟题〉，《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49。

并且兼读史书，如此即“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⁵³。他赞同赵鼎以及陈公辅之谓王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结果造成“虚无之学，败坏人才”⁵⁴，似乎有意以王安石比拟王阳明，指责明代空谈之弊。考制方面，既然士子必须熟悉经典，为了避免投机取巧，首先“不当分经试士”⁵⁵，并在科场中“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⁵⁶。其次应该“急于去节抄剽盗之人”⁵⁷，他引欧阳修的建议：

举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对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⁵⁸

顧氏認為除去歐陽修所謂的“七等之徒”科場就會“自此而清”。⁵⁹

顧亭林之批判科舉，在於針對時弊而並非欲從根本上取消科舉。他認為，經世的實踐仍然有待開科所取之士，這點可以從他

⁵³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史學〉，《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58。又謂：“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人自不得不讀《通鑑》矣。”見〈擬題〉，《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46-947。

⁵⁴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經義論策〉，《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39。

⁵⁵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見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擬題〉，《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46-947。

⁵⁶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經文字體〉，《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56。

⁵⁷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三場〉，《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44-945。

⁵⁸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三場〉，《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44-945。

⁵⁹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三場〉，《日知錄集釋》第二冊，頁944-945。

认同明太祖关于科举的观点看出：

（太祖实录）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⁶⁰

总之，科举虽然有其弊病，但仍是“求实用之上者”。

四、博学、笃行、知廉耻是经世之根本

有明一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利禄提奖后生，以至崇奢好利。《日知录·作文润笔》对文人贪求富贵恨加讥刺，以为此乃商贾之习，不足为训。与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的目的相同，顾亭林对文化风俗的探寻，同样寄托着深沉的兴亡之叹。换言之，士人们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安身经世，而非贪图名利。顾氏之安身理论主张“博学”、“笃行”，强调经典之外不多作、不妄作寿文、墓志等虚美之文，而是必须直扣本源求之于诸经以及先儒理学之书，此即顾氏所谓“正人心急于抑洪水”⁶¹。虚美之文在嘉靖时即已泛滥，我们看权臣严嵩以文坛领袖自期和自居，并处心积虑地造舆论、造声势，比如他的《钤山堂集》，就先后请了若干文坛名流为之作序。今所见《钤山堂集》，以“正德乙亥（1515）冬十一月十日，中顺大夫、鹤庆知府、前工部郎中，鹭沙孙伟”之《钤山堂诗序》为最早，其次为唐龙序，署“嘉靖辛卯仲秋既望，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唐龙”。嗣后陆续有“嘉靖壬辰（1532）冬十二月朔”刘节序、“嘉靖癸

⁶⁰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经义论策》，《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40。

⁶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河渠》，《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742。

已（1533）夏至前二日”黄绾序、“嘉靖十二年（1533）岁在癸巳五月庚戌”王廷相序、“嘉靖己亥（1539）孟秋日”崔铣序、“嘉靖乙巳（1545）三月之望”张治序、“嘉靖丙午（1546）三月望”王维楨序、“嘉靖丙午（1546）夏五月望”杨慎序、“嘉靖三十年（1551）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湛若水序、“嘉靖己未（1559）三月望”赵贞吉序等，皇甫汭序年月不详。孙伟至崔铣诸序均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前。后五序则作于严嵩专国政期间。无论是作于哪一个时间段，诸序都或多或少对严嵩“起家翰林”、“早游金马之署”的身份有所强调。⁶²这里仅举一例，已可见吹捧之盛，叹为观止。权势者向知识人招手，这些都不是泛泛之辈：杨慎是李东阳的入室弟子，正德、嘉靖年间的诗坛重镇；湛若水是名满天下的白沙弟子理学宗师。严嵩不厌其烦地请这些人来抬轿子，他们也愿意借儒学以包装一己之私利，难免少了寻求独立并对权势提出质疑和批判，无疑折射出顾亭林对嘉靖朝世风的忧虑，这样说

⁶² 杨慎序云：“愚捧读元老介溪先生严公《钤山堂诗》，而有发焉。公起家翰林，蛮英宇内。方其翔螭署而徊鸾坡、讲金华而议白虎，已睥然负霖雨之望，及登紫庐，坐黄阁，日侍赓歌，重兴雅颂，春容大篇则击乎韶濩，缘情绮靡则燿耀乎国风，郊、岛之寒瘦，元、白之轻俗，皆不入其胸次而染其性灵，若夫穿天心，出月胁，牛鬼蛇神，时花美女，又所谓骇而不可施之庙堂而唾去于藩篱之外者也。盖其志则师乎陶、伯、周、召，而其体与辞则友乎韦、匡、沈、王、二张、两李也。亶其传乎！”湛若水序云：“嘉靖三十年三月朔旦，元相大学士介溪严公，以其《钤山堂文集》三二卷寓甘泉子于天关，授以首简叙之。于时水也以病废文字十馀年矣，焚香对书，再拜再拜，复再再拜。上以答公礼数之殊也，亦以贺公求言之笃也。曰，推公此念，人将轻千万里，来进之以嘉言矣，况受知如水者乎？展而读之，凡为赋、诗、古律、绝句七百八十，颂、序、记、碑五十有九，内制，讲章二十有七，杂着二十有五，铭四十有三。曰：富矣哉集乎！娴矣哉文乎！有诗不戾乎风雅、汉唐矣！有言不戾乎训诂、诏令矣！于是心悦而神悸焉，恍然如入陶朱之室，开宝藏之库，万珠烁灼，光彩夺目，令人应接不暇，又恍然若自失也。”见明·严嵩，《钤山堂集》，影印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1、10-11。

并非无的放矢。儒者的暧昧游移，平添了社会大众的困惑。⁶³另一方面，嘉靖中期，王门后学与严嵩拉上了关系，基于后者的配合，明世宗对知识界的控制变本加厉了。但正是在此时，王学也迎来了历次伪学之禁后一个真正自由发展的时代，这与王氏门徒逐渐身居高位有关，恐怕也与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脱离不了干系。

明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我们似乎应该特别注意此时士人对于财富的看法，王文禄所言：“‘人恒言富贵，不言贵富，富先贵，何也？’廉子曰：‘财利者，民之心义之和也。由今观之，贵亦求富而已。’”⁶⁴可为佐证。名人撰写时文墓志有润笔，而且嘉靖、隆庆间润笔价越来越高。卖赋的例，可举出利瓦伊桢所撰《谢少连传》⁶⁵，谢少连活动于嘉靖、隆庆间，稍后的利瓦伊桢写了大量的寿序、家传、墓志，其中为商人写的寿序、家传、墓志就有一百〇三篇之多，无疑其中不少是收取润笔的。⁶⁶祝允明《祝子罪知》：“道学之名甚尊，伪学之利甚

⁶³ 正德十年（1515）甘泉因母丧归家，开始卜西樵为讲舍，“多士来学，支与日给钱米”，用雄厚的财力做讲学的外在保障。在以后的讲学生涯中，湛若水也从不惮与商人来往，甚至弟子中不乏扬州、仪真等地的巨富，他自己称之为“行窝中门生”，大概都是两淮地区靠盐业起家的暴发户。此辈到处请托，成为当时人的笑柄。而湛若水本人据说也颇具乃祖遗风，“算计鸡豚，秋毫不爽”，平生以广田益宅为务，甚至借“建书院置学田为名，必得之为自殖计”，被乡人讥笑为“此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也”见明·蒋一葵：《国朝》，《尧山堂外纪》卷九六，影印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167。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谭槩》引此条多出“不是随处体认天理，还是随处体认地理”句，更是用皮里阳秋的口气讽刺，见明·冯梦龙辑：《体认天理》，《古今谭槩》卷二一，影印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413。

⁶⁴ 明·王文禄，〈良贵篇〉，《竹下寤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页71。

⁶⁵ 明·利瓦伊桢，〈谢少连家传〉，《大泌山房集》第六十册，卷七〇，安徽巡抚采进本，页41。

⁶⁶ 余英时先生说：“我们可以说，润笔发展至此已超出传统的格局，而和今天文学家、艺术家专业化的观念很相近了。”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1998年，页15。

厚，莫不小祸于初，而大获于后。官不峻而势益张，权愈失而力转重。时君通国莫敢婴其锋，以是黠子从之如狂。从古以来，窃声利者无若此涂之捷也。伪学二言，为世大讳。虽宋社已亡，而其弊固在。”⁶⁷这实际上是对着程朱理学说的。这里并没有言及道学之善，而祇是说藉道学之名渔猎富贵。因此，顾亭林提出“行己有耻”观念时，我们应该注意这不仅仅是亡国亡天下、易代失节的问题，更应该把这个观念放置到亭林对嘉靖以下士人的批判：

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吾见近日之为文人、为讲师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讲名者也。子不云乎：“是闻也，非达也，默而识之。”愚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⁶⁸

他在尺牍往来中，对当时所谓文人，屡有严厉的批评。他屡引刘忠肃的话倡导摒弃名利，以实践的道德理性改变明代空谈的风气，如云：

《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⁶⁹

又曰：

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

⁶⁷ 明·祝允明，〈刺道学〉，《祝子罪知录》，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597。

⁶⁸ 清·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三〉，《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页97。

⁶⁹ 清·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三〉，《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页96。

不苟于世，人以为狂。⁷⁰

无一不是针对文人追求厚禄美名而言。前引严嵩获儒者写序得一大本，这里不妨再引一段明人见解作为补充：

近代贪甚矣，罗整庵，崔后渠，湛甘泉皆不斥贪，而斥杨、陆为禅，且暗指阳明公，何也？虽阳明公讲学，亦不斥贪。……甘泉居乡，乡人多怨，何可斥慈湖及象山？……然慈湖极廉，岂放利者可同乎！⁷¹

此一等话，虽为王世廉一人自述，但可代表晚明实际精神之大体面向。此事在正、嘉、隆时期，正可指出理学家之不同趋向。上文暗示湛甘泉是放贷的，我们都知道湛甘泉是讲存心的⁷²，存心就要克制私欲，但其所谓“随处体认天理”⁷³又对士商合流的社会充满吸引力。顾亭林的儒学思想在内部以批判心学作始，终究要从行动或实践阶段讲究经世治道，而不仅仅寄托于心体之上。又如湛甘泉等心学门徒说谈“体用同源”、“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这点亭林也不表赞同，顾氏与李颀往来函辩三次⁷⁴，就是谈这个问题，尤其点出了在诠释体用观念时，应避免禅语的窜入，不主张内学外学的区别。顾氏平生所反对的理学，仅限于掺杂禅学成分、不重读书的理学，从来没有反对从五经四书所提炼出来的理学，他对程颐、朱熹的言行一致也十分推服，这才是全祖望“经学即理学”之确解，其理在此。

⁷⁰ 清·顾炎武，〈吴同初行状〉，《亭林文集》卷五，《顾亭林诗文集》，页113。

⁷¹ 明·王文禄，〈虚受篇〉，《竹下寤言》，页65-66。

⁷² 明·何塘，〈湛甘泉考绩序〉，《柏斋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491。

⁷³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弘治十年丁巳（1497）引〈上白沙先生启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5。

⁷⁴ 清·李颀，《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148-152。

今再深一层分析之，东林顾宪成早已评论当时不关心“世道”，只知“讲求性命”的心学家。这个评断与顾亭林并无二致，可以说是同样思考背景下的呼声，亭林《日知录》就称自家著作是“经术”、“治道”、“博闻”三段⁷⁵，思想内部争论非考证不能解决问题，回到经典成了迟早问题。⁷⁶这也是亭林从“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⁷⁷提出的思路，重新焕发经典的平天下之道，尤以特别强调制度与风俗的重要，正所谓“风俗者，天下之大事”⁷⁸、“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⁷⁹。亭林提出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看起来似为两种选择，其实则一：“博学于文”以求治道之方，“行己有耻”是整体内在对于道德的要求⁸⁰，两者仍是看重内心洗涤，不可偏废。从思想上来观察这一转变，宋明儒说心性都重先天，现在则转重后天，转向社会性的、与经典的“博学”合一。“博学于文”更是以此来改变转向内在心性的偏向，回到经典以认真看待知识，褒廉知耻斥空疏，一字一句寻求真义以支持道德理性。此乃本文虽以亭林与嘉靖一

⁷⁵ 清·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页98。

⁷⁶ 顾亭林《日知录》钞有嘉靖二年（1523）会试考试官蒋文定、石文介发策，论及朱、陆之争及当时学者欲强而同之，乃至欲焚毁著书，诋毁思想，可见水火之不容。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朱子晚年定论〉，《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1086。

⁷⁷ 清·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页73。

⁷⁸ 顾亭林引罗从彦语，见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宋世风俗〉，《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773。

⁷⁹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周末风俗〉，《日知录集释》第二册，页950。

⁸⁰ 论者谈及“行己有耻”更多是将此放到易代时对失节人士的批评，但我更愿意把这点放到整个士阶层的要求，不至于一代或易代。此何故？正因明代心学退归内心世界，无耻乃是不知耻，不能“慎独”“律己”，无法抵御“外物”的诱惑，全凭一己私利行事，这完全不脱离顾亭林文章的思路。“行己有耻”虽典出《论语·子路》中子贡与孔子的问学。亭林不可能不知道孟子也曾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荀子“人不知羞耻，乃不能成人”、陆九渊说的“耻存则心存，耻忘则心忘”，因为亭林明确提到“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明显有继承关系。按照孔子对士的诠释，有耻成仁，使于四方，是一体两面。

代评语为主线，却并非只停留于此，目的是寻找亭林经世理论的一些根据，并由此考察其言行与儒家政教之整体规划。总之，在顾亭林的经世思想中，博学、笃行、知廉耻不单只是内圣的道德修养，同时也应是外王的社会事功。

五、结语

以上所述，乃顾亭林在传统论题上批评嘉靖风气的大节目，藉以了解其发言的心理背景，以重新将种种批评放置回当时的思潮脉络，此实在是关系到嘉靖前后世风的变动与社会观念的转化。此处再录一证于后，观顾氏对整个嘉靖社会具体而微之把握，以作收束。《天下郡国利病书》保留了第一手文献，卷三二引《歙县风土论》把明朝按春夏秋冬四季划分加以比照，说洪武至正德是春，弘治是綦隆；正德至嘉靖时夏，“东家已富，西家已贫”，社会贫富分化；嘉靖末至隆庆是秋，其时“未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万历以来是冬临，“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⁸¹。此虽一县所见，惟亦可观明朝自万历以后确实进入衰退期，无论政治教化乃至经济社会已不足应付所需，于此中可思过半。换言之，亭林从“博学”到“有耻”之肯定，作有条理的思辨与考察，主张回归典籍、撰三论、倡耿介、重节义，所顾虑的是缺乏客观“定理”的心学，认为心学会导致道德约束力的瓦解。也就是说，亭林与晚明诸老乃转向理智方面去寻求外王的共证。亭林所重乃以风俗察世变，不悬空偏谈性理，而喜论

⁸¹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影印四部丛刊三编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130。又可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钞录大量嘉靖文献之观察，特别是卷二三“常州镇江”，第596册，页3、7；卷四二“山东”，第596册，页439；卷八四“浙江”，第597册，页46；卷九二“福建”，第597册，页265；卷九四“福建”，第597册，页303。顾亭林还记载嘉靖末大量赋役活动、丈量土地，直言“诡词匿呈、混淆视听”、“贫无立锥”等对此时风气的批评。

时代风气与人心，迄其晚年皆坚守己意，其学少变。经世问题乃亭林一生心志所在，尤以明嘉靖政教之变化，是其关怀并寻绎归结处，认为其时学术废而人才丧，国运亦随之而衰。此时已不能闭门大谈做圣人，而要切切实实读书，看如何处天下事。经世问题乃随着社会发展而来，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共存。顾氏坚定地认为，学术、人格与时代风气紧密相关，单纯空谈心性终究后无退路。因此，在经世思想上，学人势必上探经籍以穷其源，博文广览而躬行实践才有去路。晚明思潮至亭林一变而从历史与社会的进路寻求解决世道人生问题，此乃时代思潮之大转变。

参考文献：

-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
- 明·冯梦龙辑：《古今谭槩》，影印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清·顾炎武，《音学五书》，影印观稼楼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影印四部丛刊三编本，《续修四库全书》第5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明·何塘，《柏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影印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李乐，《见闻杂纪》，影印明万历间刻清补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利瓦伊楨，《大泌山房集》第六十册，安徽巡抚采进本。

- 黎业明,《湛若水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清·李颀,《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 清·梁章钜,《制艺丛话》,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咸丰九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林尧俞等纂修,俞汝楫编撰,《礼部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 明·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陆深,《俨山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钱谦益撰,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有学集》,《钱牧斋全集》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日·山井涌等撰,《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87年。
-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 清·谈迁,《枣林杂俎》,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 明·王文禄,《竹下寤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
-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明·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明·严嵩,《铃山堂集》,影印明嘉靖二十四年刻增修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3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1998年。
- 余英时,《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台北:时报文化,2007年。

-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影印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年黄楷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 明·张孚敬，《张文忠公集》，敬乡楼丛书，1935年。
- 明·张居正，《明世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
-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明·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朱之瑜，《朱舜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